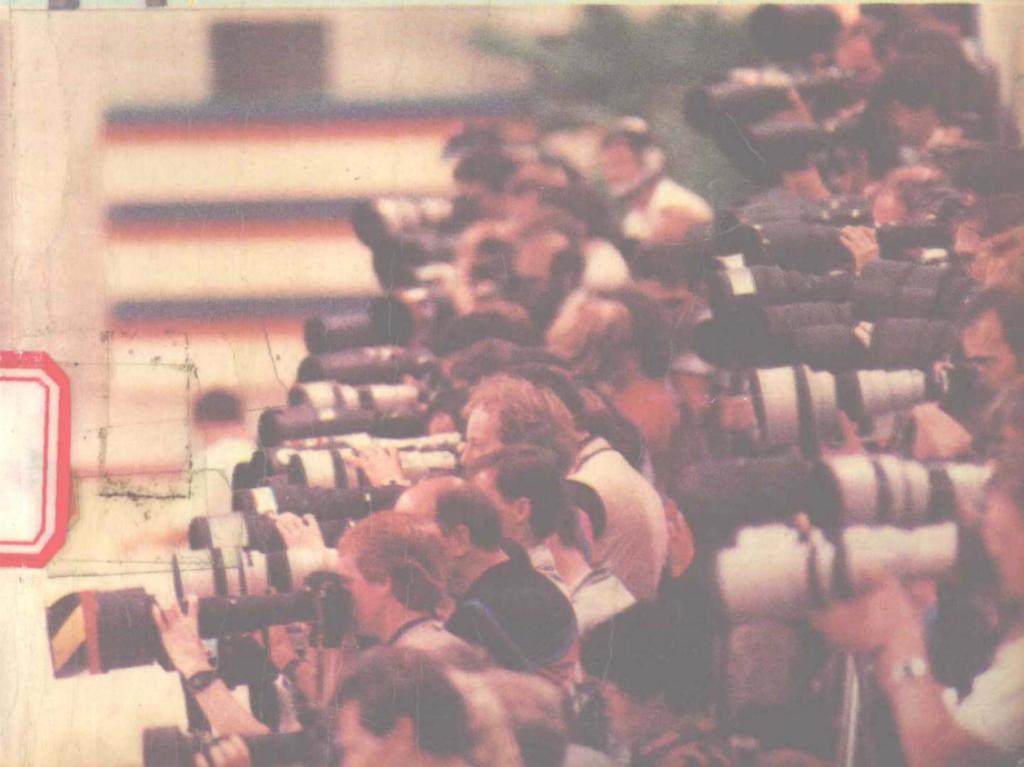


世纪之交

汉城奥运会实录

中国 鲁光 著



世纪之我

——汉城奥运会实录

中国 鲁光 著



世纪之战

鲁光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1/32 6.375 印张 132 000 字 插图 15 张

1989 年 7 月第一版

198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7-0202-5/I·117 定价：2.80 元

目 录

一、大千世界的遐思	1
二、安全门与十万军警	7
三、山谷秘地——泰陵	26
四、不夜的村落	32
五、雕塑公园的魅力	37
六、竞争——汉城的主旋律	41
七、萨马兰奇印象	51
八、池畔心态录	63
九、挥一挥手却难说再见	69
十、上帝在游荡	77
十一、“世纪之战”的幕外与幕内	83
十二、五洲的“女强人”	112
十三、中秋之夜云遮月	118
十四、收藏家的“特殊市场”	124
十五、任职美国的中国女性	133
十六、兵败如山倒	140
十七、机遇钟情于她	149
十八、汉城与汉城人	164

十九、偷盗案发生在新闻中心	181
二十、圣火熄灭后的思索	186
二十一、写在末尾的话	198

人类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千世界虽然常有风云变幻，虽然人类处于一个并不太平的太平世界之中，但新的世界大战的风烟始终没有燃烧起来。世界没有战争，但竞争却从来就没有止息过。经济大战，科技大战，体育大战……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奥林匹克运动会，被人们称为“和平时期的世界大战”。一生中，假如能亲身经历一次这种体育上的“世界大战”，那无疑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是，经历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不将这场“世界大战”的真情实况记载下来，那会遗憾终生。

为了不使自己有朝一日陷入遗憾的苦海，我不得不挥动这枝笨拙之笔，写下这些粗糙而又令人难忘的文字。

一、大千世界的遐思

1988年9月2日，在将近黄昏之时，我飞行在日本海上空。没有云彩遮拦，视线可以直达苍茫大海。人的思绪是很奇异

的，简直象一只自由自在的神鸟，此刻正翱翔在历史的天宇。

约摸距今十七年之前，我曾有过一次傍晚飞行在日本海的经历。那是 1971 年 3 月 21 日黄昏，我们的座机——德航波音 707 猥过日本海，向东京飞驶。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飞往日本。也许正因为头一次，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而且那时我们正处在“文革”期的中国——这个“红色的海洋”中已经度过了五年的漫长岁月，突然飞往象日本这样的异国他乡，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新鲜感。

我当时是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去参加那年 3 月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我的身分是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参加世界比赛，眼下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却惊动了中国的整个决策层——从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一直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1971 年的一个春夜，我已经躺下休息。突然楼下传来呼叫声。我急匆匆赶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只见偌大一个大厅里已坐满了人——参加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他们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总参谋部副总长王新亭、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荣，见过周恩来总理后，从人民大会堂匆匆赶来。

“周总理要我们来，给大家出一道题目，考一考大家。就是请大家议一议，讨论一下，到底去不去名古屋比赛。”韩念龙副校长介绍完总理召见的情况后，这么说道。他说得有点艰难。

“我吃了安眠药刚入睡，就被总理的电话叫醒。我是刚从人民大会堂赶到这里来的。”韩念龙向在座的人们作了这样

个老老实实的解释。

我们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本来，组团参加名古屋比赛的事，不久前已经敲定。而且，已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代理主席宋中与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会签了文件。我们都知道，周总理是亲自过问这件外事活动的。他接见了后藤钾二，感谢他对“恢复中日之间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是不是国际风云有了突变？国内形势有了突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还神色严肃地问过韩念龙等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会不会周总理也感受到了某种压力？

我们感到突然，也感到茫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多数人感到了压力，说：“那就不去算了。”但也有少数几位同志是“主战”的。他们认为，既然已跟日本人签了字，不去不好交代。折中的方案是去还是去，但去了不打比赛。讨论到最后，有些运动员干脆说：“去不去，听中央的。叫去就去，叫不去就不去。”

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坐等消息。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紧皱着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半晌沉默不语。最后，他说：“左右权衡，我们还是应该参加……”他边说边站立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杆粗铅笔，果断地说：“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我现在就写报告请示主席……”

周恩来铺开信纸，埋头给毛泽东写报告。此时，天亮了，阳光已洒落在天安门广场。

这天上午，毛泽东主席看过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报告，挥毫批了“照办”两字，并明确写道，“我队应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把这个银白色的小球，从中国打了

出去。

我们代表团临出征前，3月16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那天，他兴致很高，侃侃而谈。而代表团的人也给总理提出了不少难题。

“总理，我们带《毛主席语录》吗？”有人发问。

如今看来，是一个笑话。但当时中国是一个“红海洋”。小小的红宝书是必须随身带的。不仅随身带，而且还要背诵。万一忘了带，轻则挨骂，重则招来灾祸。传闻，红卫兵就曾当众强令一位元帅背语录。那位元帅背了语录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说：“我从头背到尾了。”红卫兵不干，非要他背诵全本语录。气得那位元帅说，对不起，老子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招来一阵打倒他的口号。虽然这只是传闻中的一段轶事，但在那个岁月里，倒也是真实可信的。

周恩来耐心地说：“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强加于人。比如下飞机，你们是不是要手里拿语录，就值得研究。”有了总理这句话，我们谁也不带那个小红本出国了。

又有人提问：“总理，纪念章戴不戴呀？”

立 在那个岁月里，每个人的胸前都得佩戴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这甚至成为识别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标记。有些人以为纪念章愈大感情愈深，有的纪念章居然有大碗口那么大，重得在胸前已戴不住，得挂在脖子上。

周恩来沉思片刻，然后回答说：“毛主席最反对形式主义。”停了一下，又说：“小的可以佩戴一个，大的不要带了……”

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听了总理这些话，仿佛吹来几道清风，使发涨的头脑，冷静了几分。

队伍未出师，恐吓信就来了。日本右翼也正闹得凶。告别家人时，我们的感情是壮烈的。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有的人甚至已作了牺牲的准备，把遗嘱都告诉家人了。坐火车到达香港之后，乘什么飞机去日本，也变得神秘起来。日航、加航、美航、德航……的经理们倒是挺有远见的。他们从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的世界锦标赛，这个动向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松动。假如有朝一日中国结束了闭关自守的局面，向世界洞开国门，那将会有做不完的生意。加拿大航空公司和西德航空公司把这笔生意抢走了。

德航非常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灵状态，给的条件很有吸引力。总经理答应：一，如果飞经台湾出故障，绝不降落台北，飞回香港或飞到上海降落；二，为了绝对安全，总经理亲自“压机”，跟我们一道飞往日本；三，行李超重不收费。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别乘坐加航和德航去日本。我乘坐的是德航波音 707。下午十三点五十分从九龙的启德机场腾空而去，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了空中小姐的英语广播：“飞机正飞越台北上空。”一听到台北，我们的精神劲儿上来了。一个个都依窗俯视台湾大地。天也作美，没有一丝云彩，阳光耀眼，台湾的山地、海滩一目了然。尤其那群山的峰峦，如无数利剑耸立宝岛，给人非常强烈的印象。海水那么湛蓝，都让人想跳进去遨游一番。我们不禁想起宝岛上的阿里山，日月潭……我们简直希望飞机能徐徐下降，让我们领略一番这块日思夜想却难以见着的祖国土地的旖旎风光。此时此刻，从动乱中国大陆带来的那股紧张劲儿，早已烟消雾散了。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乒坛名将感叹道：“我想，将来第一支踏上台湾，

为台湾人民打表演赛的，是我们乒乓球队。”

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已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北京到日本，不再需要绕道香港飞行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可以直达东京。虽然，这次我没有机缘再飞越台北上空，但十七年前那位乒坛名将的话语，仍然那么响亮地回荡在我的耳畔。十七年前从机窗俯瞰到的台北风光，依然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十七年，风风雨雨，经历了多少变化呀！海峡两岸，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对抗了。虽然台湾当局还不愿向大陆开放，但台湾人却潮水般涌向大陆。就在我离开北京前夕，还见到了几位台湾新闻界的同行。我们可以坐在一家餐馆里，一边品尝美酒佳肴，一边随意神聊……

从敌视走向友善，从对抗走向对话。这不仅是海峡两岸发生的变化，世界呢，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不也朝这个趋势往前走吗？

已经飞临世界最大的都市——东京上空了。灯火，看不到边的灯火，在机翼下缓缓往后移动。我的思绪，仍然象只自由自在的神鸟，又翱翔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长河的上空。

1972年在西德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已发生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枪杀的恐怖事件。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奥运会，开始出现分裂，大多数非洲国家由于南非问题未获理想解决而退出了比赛。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上，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风云突变，美国、西德、中国、日本、肯尼亚、加拿大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国家宣布抵制。而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又宣布不参加。政治染指体育，使

奥运会遭到了一次又一次分裂的危机。但经过这几次的抵制之后，人们清醒过来了。抵制奥运会，并没有给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却耽误了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优秀运动员。对一位选手来说，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么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一旦失去这个机会，他们就失去了运动生命。

无论政治家，还是体育家，人心思合。汉城奥运会，遇到了一个理想的国际气候。东方与西方都向汉城走去，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欢聚一堂。这将成为本世纪奥运史上最隆重的一次盛会。

啊，大千世界，久合必分，久分必合！

空中小姐在提醒我们系上安全带。巨型客机开始徐徐降落。在我们的机翼下，是一片灯火的海洋。它已不象十七年前我们见到的那么神秘、那么新鲜，但它确实比七十年代的灯火更加璀璨、更加明亮……

二、安全门与十万军警

在羽田机场办妥过境手续，刚走到宽大的候机大厅，就瞧见迎面高墙上悬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为了奥运会和您的安全，请配合！”红布上的字，分外显眼。好家伙，南朝鲜的保安措施都用到日本来了。

说真的，我压根没有想到，会在东京的机场看到这种标

语。正因为太出人意料，所以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第二天，我们一行记者登机时，就尝到这种“配合”的滋味了。

防险于国门之外

过安全检查门时，我们整整耽误了三十分钟。一位日本海关人员将我们同行记者缪晖的手提包打开，翻找了好一阵，好象是找不着想找的东西，干脆把手提包里的物品一古脑儿全倒了出来。

“你带什么了？”我们在一旁等得有些焦急了，这么问缪晖。

缪晖是我们《中国体育报》驻湖北的记者，虽然是足球队长出身，但个性内向，不爱说话。他只是冲着我们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没有带什么违禁品。

可是日本海关警察并不放行，又将空包提过去，重新照了一次爱克斯光。

离起飞时间只有十多分钟了，我们都有几分焦躁不安。

日本海关警察不慌不忙地拉开提包里层的一条小拉链，伸进手去，好半天才拿出一把小刀。他将小刀举起来，左瞧右瞧了好一阵子，然后很严肃地对缪晖讲：“这刀不能随身带走。”

缪晖也急眼了，说：“这是一把削水果的小刀呀！”

日本海关警察一点也不通情，拿出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木盒，说：“你填写一张表格，然后装盒托运。”

这一耗，都到起飞时间了。缪晖拎起手提包，无可奈何地说：“这刀，我不要了，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总算通过了安全检查的关门，我们一边拉着箱子，一边往里面的候机室走去。

“你带的是把什么刀呀？”我问缪晖。

“削水果用的，不过是西德出产的，挺好用的，真有点可惜。”缪晖边走边回答。

走进候机厅，我们发现人民体育出版社的摄影记者王英恒还未进来。

我放下行李，往回走，这才发现，他还未过安全检查关卡。海关人员要他将那只捆绑得非常结实的大皮箱给打开。皮箱装得严严实实、井井有条的，一打开不就乱了套了吗，但海关人员的话就是命令，再麻烦也得打开呀！瘦弱的老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打开了皮箱。

海关人员翻寻着什么，把整个箱子都翻乱了，也未翻寻到想找的东西。最后，在箱底翻寻出两把宝剑。

“请把它们打开！”海关人员自己不动手，让老王打开宝剑。

我们在一旁看到此情此景，心里直叫苦。这个老王也真是的，干什么要带这两件“凶器”出国呀！多耽误事！

老王将宝剑打开了，原来那是两把可以折叠的练武术用的宝剑。剑虽明亮耀眼，但实际上都是空心的，剑尖也其钝无比。海关人员不管这些，仍然查得那么顶真。他们拿起宝剑摇晃了好一阵，听听里面装东西没有，然后又用手去试了试剑尖，看锋利不锋利。

老王急得直比划，说明此剑是练武术用的。日行记者小沈也上去用英文跟海关人员讲述此剑的用途——送朋友的礼

品。几位海关人员用眼神交换了看法，确信是礼品剑之后，终于挥挥手，放行了。

南无阿弥陀佛！总算耐着性子作了一次“配合”。

正当我们松了一口气，提着箱子准备从甬道登机时，我们发现，通往飞机的甬道口上还有一道安全检查。

真纳闷儿，一般上飞机，都只有一道安全检查，今天怎么会有两道安全检查呢？

“请你们原谅，我们是从南韩来的。”一位穿着笔挺的青年检查员用相当流利的汉语对我们说。

原来这第二道安全门，是南朝鲜人跑到日本来设立的。因为不能在日本领土——机场、候机厅设立检查点，他们就别出心裁，在通往飞机入口处的航空通道上设卡把关。

这些南朝鲜人检查得比日本海关人员还严格。我们只得耐着性子，一个个被重新搜了一次身。有的记者又不得不重新打开一次箱子，重新拿出那些有嫌疑的礼品，让南朝鲜人再检查一遍……

当我们在自己的机座上落座时，飞机已经晚点了一个多钟头。这个航班是美国航空公司的，向来以准时饮誉国际旅客，可这次却失信于众了。

“唉，南朝鲜可真是防险于国门之外呀！”当飞机开始腾空时，我们禁不住发出感叹。

爆炸！ 爆炸！！

两个多钟头之后，汉城的金浦机场在望了。舷窗外，一片

漆黑。睁大眼睛使劲看，也仍然是漆黑一片。但我渴望能意外地看见一点什么。面对着一个黑暗的世界，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终于，我看到了几团幽幽蓝光。待飞机快降落地面时，我看清那几团幽幽蓝光——KIMPO，金浦国际机场到了。

虽然浓黑的夜幕笼罩着它的真面目，虽然我是第一次降落在这个国际机场，但关于它，我并不陌生。不过，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次恐怖的爆炸事件。

两年之前，第十届亚运会正要在这座城市揭幕。世界各地的游客正云集汉城。1986年9月14日下午三点十五分，金浦机场的大厅里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火光、浓烟弥漫了大厅。当场炸死三人，伤十一人。当晚，这个爆炸新闻马上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荧光屏上，给参赛的亚洲选手和亚洲人民以巨大的震惊。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专机原定第二天——9月15日抵达。还能按时飞来汉城吗？代表团的联络官许放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这个突发事件作了详细记载。

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办公室内专用电话的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亚运村村长鲜于良国的声音：“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务必请来一趟……”我故意问了一句：“哪一方面的事情？”鲜于良国急促地回答：“有急事，急事！”我放下听筒，正要起身，只见组委会派来我团的朝文翻译金先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讲：“许，许，许先生，请您赶快去，去村长办公室，我带你去，我的带路！”

去村长办公室的路上，我问金先生：“今天怎么啦？”他摇

摇头，说他也不清楚。我告诉他：“村长着急见我，肯定是要解释一下今天下午金浦机场的爆炸事件。”他大吃一惊，直说：“这怎么可能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保安措施极其严密……”

我走进鲜于良国的办公室，里面已挤满了一大堆人，气氛果然紧张。鲜于良国把我让进了隔壁会议室。五分钟后，村长指示其助手宣读一份早已打印好了的文件：“今天下午三时十五分，金浦机场发生了爆炸，死三人，伤十一人。今后我们将加强机场管制，采取更加严密的保安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时坐在我身后的金先生小声对我说：“许先生你怎知道机场爆炸一事的？”我说：“我们的秘书长魏纪中先生早就对我通报过此事了。”他听后眨眨眼，低头不语。

魏纪中在这一天的下午近四时，去亚运会新闻中心看望新华社记者，一位日本记者向他透露了一个新闻——金浦机场发生爆炸了。这位瘦高个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立即想到，明天袁伟民和徐寅生率领的人员将乘一架专机在金浦机场降落，机场发生爆炸，专机还起飞不起飞？他马上把陪同——南朝鲜安全部的黄先生找来。

“听说金浦机场发生了爆炸事件，马上给我接通组委会安全部的电话。”魏纪中急切地说。

“不，魏先生，这是不可能的。”黄先生一直跟着魏纪中，还蒙在鼓里呢。给安全部的电话接通之后，魏纪中用英文对安全部工作人员说：“请应证一下金浦机场的爆炸事件。”

对方故作镇静：“你从哪里听来的？”魏纪中紧逼对方：“请马上应证！我们要决定明天专机起